

# 八月宗派事件：朝鲜劳动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挪威-为人民服务

青辰 译

译者注：这篇文章发表在挪威毛主义团体“为人民服务”媒体的官网上：  
<https://tjen-folket.no/index.php/en/2020/05/14/the-august-incident-the-fight-against-the-right-opportunist-line-in-the-workers-party-of-korea/#easy-footnote-bottom-1-13976>

该文简要讲述了 1956 年发生在朝鲜的“八月宗派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抨击金日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篡夺朝鲜革命，镇压革命派，实行反动统治的事实。值得一看。本人翻译水平不佳，希望读者能够相助。

本文由挪威为人民服务媒体的评论员撰写，最初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在挪威出版。

本文将试图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生的一件重要事件以及其路线斗争进行一些细微的描写，这并非完整的叙述，且本文可能包含一些缺陷。本文也不会对朝鲜劳动党的右派路线进行全面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希望本文能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起点。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朝鲜劳动党内的矛盾达到了极点。在党的三中全会上，党的左右路线斗争达到了高潮。这次高潮被称作“八月事变”，它对朝鲜劳动党内的左派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 背景

朝鲜在 1910 年被不断对外扩张的日本占领，侵略者暴力镇压朝鲜人民，反动军警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朝鲜被侵占九年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民族解放运动，称为“三一运动”。这场运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许多参加运动的人被迫流亡到中国等地。在这些人的中有许多关键人物，他们将在未来 25 年里成为朝鲜劳动党内左派的重要人物。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流亡中国的朝鲜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武亭。他最初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一名将士。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出色的能力，使他在党内声名鹊起。最终他成为朝鲜义勇军的最高司令官，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内把武亭看作是

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潜在领袖。[1]

渐渐地，朝鲜民众和流亡在外的朝鲜人都开始组织抵抗日本侵略的团体。他们中的一些人积极参加了反对侵略的游击战争，一些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

二战期间，苏联解放了朝鲜北部，而美国占领了南部。统一朝鲜的谈判失败了，朝鲜被一分为二。社会主义的北方由新成立的统一政党“朝鲜劳动党”控制，金日成任主席。资本主义的南方则由李承晚控制的美国傀儡政权统治。苏联红军于1948年撤出朝鲜。其后一年内，大部分美国军队亦撤出朝鲜。但是南北之间的火花很快就被点燃了。1950年6月25日，战争再次爆发。苏联和中国支持北方的人民共和国，美国，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支持南方政权。

金日成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取代金日成成为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在战争期间，机会主义者们已经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金日成领导了一次清除革命派的行动——他认为他们是威胁。他集中罢免了在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左派代表。

武亭是革命派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最早被清洗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2月，他就失去了军队二把手的地位[2]，两年后他就去世了。最初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革命派，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几个担任重要职位的人。这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隐患。

## 爆发

1956年是反革命的一年。走资派发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变。2月，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背叛了斯大林和马列主义。党内左派（布尔什维克）被系统性地清洗、监禁和杀害。朝鲜劳动党内的右派很可能尝试做类似的事情。

党在四月份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左右路线的矛盾开始显现。但对右派发出批评声音的尝试遭到了严重的打压。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导的领导层篡改了所有作为讨论基础而提交上来的提案[3]。

就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四个月，金日成率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会见了赫鲁晓夫。与此同时在国内，党内的左派开始策划针对金日成主导的右派分子的政变。民族保卫相（注：国防部长）崔庸健是右派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他在知悉了左派打算做什么之后，向金日成发了一份电报，通报了国内的左派行动[4]。金日成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在原定党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人们才被告知，大会从8月2日被推迟到8月

30日。金日成秘密下令在边境驻扎作战部队[5]，许多便衣士兵被派往平壤各区[6]。此外，在平壤北郊部署了两个陆军师。

这一切举动都是机会主义者狡猾的伎俩，目的是迷惑和恐吓党内的左派，使他们失去影响力。因此在党大会召开时，会议乃至整个平壤的气氛都较为平静。但是左派没有停止斗争。

金日成在大会开幕时发表了此次率团出访苏联和东欧的报告，但在报告最后，他突然改变了主题。在报告的结束语中，他向反对派发出了清楚的警告：如果有人提出批评，那么谁就是党的敌人。

*“…敌人想以此分裂我们党，企图挑拨我们与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提高警惕。[7]”*——金日成，一九五六年八月三中全会开幕词

接下来发言的是左派的尹公钦。右派代表们试图通过喊叫来打断他的讲话，但他继续坚持他的演讲[8]。在喊叫声中，人们可以听到最初的一些讲话片段：

*“我们的同志们受到了威胁和监视，他们奉献于党和革命，他们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他本人粗暴地践踏党内民主，压制一切批评声音，这些行为完全地违背了党章和列宁主义党的民主生活的基本准则，这意味着对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破坏。[9]”*

由于右派势力的积极破坏，大厅的气氛变得混乱起来。但金日成和委员会成员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混乱，相反，他们呼吁人们跟着一起喊叫。很明显，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演讲最终完全被叫喊声淹没了。接着，金日成提议，“反党分子”不宜再发表演讲了，他的发言应该立即停止。

崔昌益是另一位左派的领导人，他和一些人提议继续讨论，但他们也遭到了责骂和阻挠。会议主席没有理会他们的提议，而是继续表决金日成的提议，表决最终以多数赞成结束他们的演讲为结束。

在下午的全体会议上，轮到崔昌益发言时，和上午会议的情况一样，崔的发言仍然被台下大喊大叫的人打断，导致他无法进行任何演讲。

## 结局

金日成在第二天的会议提议，将更多的左派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其中就包括崔昌益[10]。然后，他提议将更多人驱逐出党，这得到多数赞成，两项提案均获得通过。除了右派，一些中间派人士也投了赞成票，他们担心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清洗对象。

一个月后，崔昌益在与一名苏联外交官的对话中阐述了劳动党的一个问题，

即党的领导干部选拔党员的错误方式。他们选拔党员的方式并非依照马列主义的原则，也不依据被选拔者的能力，而是依据对党的路线忠诚与否[11]。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数人投票赞成金日成的提议，尽管左派占该党的多数[12]。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左派人士回家之后发现，他们家的电话线被切断了[13]。他们由此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在晚上被捕。四人在当晚逃至中国，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关于这次危机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们除了对朝鲜领导层提出批评外，还写到他们逃到中国的原因：

*“我们认为，如果金日成逮捕并处决我们，那将不会给革命带来任何好处。”*  
[14]

右派在12月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大清洗，大约300名左派党员被驱逐出党。[15]自此，左派对该党逐渐失去影响力，军队里余下的几位左派将领在56年底被清除。

这引起了中苏两国的关注。毛泽东会见了朝鲜劳动党的一个代表团，在那里他批评了他们对所谓“八月事件”的处理方式。他敦促他们在党大会上通过求是地讨论，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对话，释放被捕的同志，并恢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

中苏两国的使节都敦促金日成不要处决被驱逐出党的朴宪永等人，金日成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是这完全无济于事，朴宪永等人还是被处决了。1957年1月的党大会上，金科奉再次遭到批判，并被剥夺一切职务。一年后他消失了，他可能被处决或者在试图逃往中国的途中被枪杀。崔昌益等其他左派人士也被拘禁并处决。[16]同年夏天，更多的党员在试图逃到中国时被捕。在10月份，另一些人也遭遇同样的境地。[17]

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内的右派势力以强硬镇压和反动暴力消灭了革命派的领导者们。显然，对党和革命威胁最大的不是左派路线，而是右翼路线的代表们，那些掌控着所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权力的人。由于这一丑行，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国际共运此时并不明朗，时间会证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者们站在哪一边。

## 后续

1966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革命浪潮。国际共运中的革命路线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到处都能看到修正主义者和官僚们的颤抖与恐惧。朝鲜领导人也不例外，金日成在1966年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说：

“‘文化大革命’可能对我们党产生巨大影响。[18]”

同年 11 月他说：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深感震惊。[19]”

由于担心反抗的浪潮会波及朝鲜，出现类似的文化大革命来攻击朝鲜领导人，他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权力。[20]如果朝鲜领导人不是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如果朝鲜没有官僚机构，或者党内有左派的群众基础——那么金日成和右翼分子没什么好害怕的。

从其党的领导层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态度来看，他们张开双臂欢迎中国的反革命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夺取政权后，“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二十年来首次得到改善。

注释：

[1] 《朝鲜历史国际期刊》（2012 年 8 月第 17 卷第 2 期），“八月事件”与延安派的命运\*，第 6 页。

[2] 《被误解的友谊：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9-1976》

[3] 《徐辉、尹公钦、李弼奎、金刚致中共中央的信》，第 7 页。

[4] 《朝鲜历史国际期刊》（2012 年 8 月第 17 卷第 2 期），“八月事件”与延安派的命运\*，第 10 页。

[5] 同上，第 10 页。

[6] 《徐辉、尹公钦、李弼奎、金刚致中共中央的信》，第 10 页。

[7] 同上，第 11 页。

[8] 同上，第 11 页。

[9] 《尹公钦 1956 年 8 月在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 2 页。

[10] 《朝鲜历史国际期刊》（2012 年 8 月第 17 卷第 2 期），“八月事件”与延安派的命运\*。（译者注：原文没有标记出自哪页）

[11] 《与崔昌益的对话备忘录》，第 2 页。

[12] 《朝鲜历史国际期刊》（2012 年 8 月第 17 卷第 2 期），“八月事件”与延安派的命运\*，第 18 页。

[13] 《徐辉、尹公钦、李弼奎、金刚致中共中央的信》，第 12 页。

[14] 同上，第 12 页。

[15] 《朝鲜历史国际期刊》（2012年8月第17卷第2期），“八月事件”与延安派的命运\*，第14页。

[16] 《朝鲜神权政治内幕：张成泽的崛起与突然衰落》，第33页。

[17] 《朝鲜历史国际期刊》（2012年8月第17卷第2期），“八月事件”与延安派的命运\*，第15页。

[18] 《朝鲜对中国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第3页

[19] 同上，第2页。

[20] 同上，第2页。